

失去的十年：美国中东战略失败的理论探讨^[1]

○ 林海虹 田文林

[内容提要]十年前的“9·11”事件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走向,以“文明冲突论”为外交政策的理论指导,推行“武力反恐”和“民主改造”政策,引发伊斯兰世界反美情绪高涨。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原本是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造成南北贫富悬殊的政治经济矛盾,而美国新保守主义却从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出发,过高估计自身力量推行“大中东民主”,使得美在冷战后本有可能进一步巩固中东地位变得影响力大不如前。奥巴马上台后,虽然明确放弃布什时期“文明冲突”理念,努力缓解伊斯兰的反美情绪,但已很难超越中东已有的现实,十年错误路线导致的“外交后遗症”不是“灵巧外交”短期内所能挽救的。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东战略 理论探讨

[作者简介]林海虹,女,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1)05-0064-06

2011年是“9·11”事件10周年。当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事件,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战略重心,进而使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尤其在中东的影响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冷战结束时,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本有可能进一步主导中东,而2001年的“9·11”事件也为美国介入该地区提供了足够的道义借口。但十年过后,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非但未持续上升,反而日渐衰减。本文试图从战略思维角度,探讨美国中东战略失败的教训。这对我们更好地认识今日世界将不无裨益。

一、布什中东战略与“文明冲突论”的理论渊源

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几乎每一种国家战略背后都有某种哲学作基础。戴高乐说,在亚历山大的行动里,我们能够发现亚里士多德。同样,我们在拿破仑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卢梭和狄德罗的哲学,在希特勒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尼采和特赖奇克的哲学,在东条英机的行动里可以发现福泽谕吉和神道教。而在美国的国家哲学中,实用主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它与英国的经验主义异曲同工,都强调从现实

和经验出发,认识和解决问题。这种思维在美国外交领域同样体现出来。表面上看,美国外交兼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大成分,但实际上却更多是以理想主义为道德外衣,掩盖现实主义的利益追求,使美国在获取实利的同时,还经常以道德捍卫者的面貌示人。而在中东,美国外交的这一手段运用得尤为明显。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整体地位提升了,但其战略思维却陷入了极大迷茫:美国未来面临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美国未来的主要威胁和对手是谁?美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对外战略?为此,各路学者纷纷出谋划策,并企图说明美国未来战略的种种理论依据。这其中,尤以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最为振聋发聩,该理论认为不同文明板块间的不同认同,是导致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并将伊斯兰文明视为西方文明的主要挑战者之一。^[2]亨廷

[1]本文受到中国政法大学课题“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国际理解观塑造”资助。

[2]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 (1993),22-49.

顿的“文明冲突”理论颇具大战略气魄,明显是要为苏联解体后美国外交政策提供理论指导。^[1]

学术观点当然不等同于外交指导思想,学术观点一旦被统治阶层接受,便会转化为现实的对外政策。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这样。该理论最初只流传于学术界,但“9·11”事件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走向。面对这种由非国家行为体制造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的现实主义解释乏力,朝野上下亟需一种通俗易懂的新颖理论进行诠释。“美国人需要把“9·11”事件放置在一个容易理解、每个历史性角色可以发挥作用的戏剧场景中。而且这种场景看起来适合美国人期待的索福克勒斯经典悲剧的序幕:即两种看不见的力量——伊斯兰与西方——不可避免地迎头相撞,并导致灾难性结果。而这种对立是由由来已久、深藏心底的上帝信念决定的,直到双方突然出现在舞台后,并爆发出来。”^[2]而“文明冲突论”看似成功地预言了这场冲突,并提供了现成的、解释力似乎最强的系统观点,因此名声大噪,附和和信奉该观念的声音日渐增强。普林斯顿大学知名东方学家伯纳德·路易斯在《大西洋月刊》发表题为“穆斯林愤怒的根源”的文章,认为穆斯林反美情绪是源于对古代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竞争的历史性反应。^[3]认为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反美情绪,源于自身政治经济的失败和无知,而非美国的过错。要想根除恐怖主义和反美主义,就必须在伊斯兰世界推行民主改造。2001年10月15日,美国学者和专栏作家扎卡利亚在《新闻周刊》撰文认为,美国要实现战胜恐怖主义分子、改变阿拉伯世界之目的,就必须进行“文明改造”。他宣称:“美国必须帮助伊斯兰走进现代世界。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无法应对的挑战,但我们别无选择。除非我们能够消除阿拉伯世界愤怒的根源,即阻止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崩溃,美国乃至整个世界所面临的重大安全威胁才能够消失。”在美国政学两界均影响颇大的新保守派,也基本接受这种观点,并将这种带有争议性的学理探讨,变成了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教条。“他们所缺的就是一场战争,以及一个性格鲁莽的领导人心甘情愿地去发动这种战争”。^[4]而2001年初布什政府的上台,恰好为新保守派践行“文明冲突论”提供了操作平台。布什政府内阁很多重要成员,如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

斯菲尔德、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等均属新保守派。布什本人又是虔诚的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公开称最认同的政治思想家就是耶稣,^[4]外交政策深受新保守派代表人物理查德·珀尔等人思想的影响,这使他间接地接受了亨廷顿的观点。

“9·11”事件的发生,为布什政府外交政策转型,践行新战略思维提供了绝好借口。2002年12月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题为“为了穆斯林世界的大民主”的演讲(后刊发于《华盛顿季刊》2003年夏季号)明确阐述了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推动民主化的计划。一周后,即12月12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传统基金会发表讲话,宣布美国为加强中东的民主启动了“美国-中东伙伴关系计划”。2003年11月6日,布什总统在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大谈“民主”和“自由”的重要性,他勾勒出一幅“大中东计划”,成为阿拉伯世界变成“成功社会”的“美好蓝图”。^[5]2004年1月20日,布什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指出,“在中东地区,只要仍然存在暴政、绝望和怨恨,就将继续产生威胁美国及其朋友安全的个人和活动。因此,美国执行在大中东地区促进自由的前进战略。”^[6]并在当年2月正式出台旨在“民主改造”中东的“大中东计划”。

布什政府中东政策所遵循的路线,与“文明冲突论”是相暗合的。^[7]布什虽然声称“美国的敌人不

[1]Dr Abdullah Al-Ahsa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oday <http://www.ssig.kpkk.gov.my/ssig/kcent/material/civilisation%5B1%5D.pdf>.

[2]Pierre Tristam Obama Declares an End to Clash of Civilizations, <http://middleeastabout.com/od/usmiddleeast/policy/a/clash-of-civilizations.htm>.

[3]Dr Abdullah Al-Ahsa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oday <http://www.ssig.kpkk.gov.my/ssig/kcent/material/civilisation%5B1%5D.pdf>.

[4](美)艾克敏. 布什总统的信仰历程[M]. 姚敏,王青山,译. 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5] President Bush Discuss Freedom in Iraq and the Middle East,November 6,2003,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3/11/print/20031106-2.html>.

[6]参考资料,2004-02-04.

[7]Dennis J.D.Sandole,The Islamic-Western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 Inadvertent Contribution of the Bush Presidency http://www.allacademic.com/meta/p_mla_apa_research_citation/0/7/1/7/5/p71755_index.html.

是我们的许多穆斯林朋友” ,而是“激进恐怖主义网络” ,但他及其同僚使用如“十字军东征”、“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等词汇 ,其列举的“邪恶轴心”和“暴政前哨”国家绝大部分是伊斯兰国家。而他们设立的阿布格莱布和关塔那摩监狱 ,以及毫无必要的伊拉克战争 ,都表明布什政府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仇视。可以说 ,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实际是一种“行动中的文明冲突论”。具体来说 ,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有两条主线 :一是师承威尔逊学派的新保守主义。它将观念性东西视为决定性因素 ,一定程度上承认“民主万能论” ,如“民主导致和平” ,“民主导致繁荣”等等 ,并认为传播这种观念性东西是美国外交的头等大事 ,并认为中东频频滋生反美恐怖 ,就是因为中东存在“民主赤字” ,所以应该对伊斯兰温和国家进行“民主改造”。二是杰克逊学派。该派主要强调为了实现美国利益 ,可以使用强力达到目的。据此推演 ,既然恐怖主义是当前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 ,因此有必要使用武力进行铲除。布什政府据此确立了“先发制人”的黩武战略。而布什政府中东战略唯一缺乏的 ,就是贝克、基辛格和鲍威尔等人的现实主义思想。

二、理论的贫困导致行动的贫困： 美国在中东 失去的十年”

我们知道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二者何先何后的不同解读 ,大体形成了唯物与唯心主义两大流派。在唯物主义看来 ,存在决定思维 ,物质生产决定社会意识。而唯心主义则持相反看法。这种区分体现到国际政治中 ,大体就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别。而“9·11”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话语中 ,“文明”、“文化”、“宗教”、“自由”、“民主”等种种观念日趋泛滥 ,逐渐成为解释国际政治矛盾(包括反美恐怖主义)的理论起点 ,其中尤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最为典型。而这种以观念解释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论 ,无疑是唯心主义的。

事实上 ,当前国际政治的根源主要是物质性的 ,而非精神性的。从根本上说 ,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是一切国际问题产生和发展的源头和基础。^[1]这种经济活动不仅使人类历史真正变成世界历史 ,乃

至形成“全球化”趋势 ,而且 ,由于各国在世界产业链分工中所处位置不同 ,因而这种国际贸易和产业分工 ,客观上形成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 ,造成“富者愈富 ,贫者愈贫” ,使南北国家间的矛盾成为国际经济乃至国际政治中的基本矛盾。而美国就是始作俑者。二战后 ,美国悉心建立起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 ,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等经济制度框架 ,及至当前竭力倡导“全球化” ,实际上这是以美国主导、制定的各种所谓“国际规则”为平台和依托 ,通过商业贸易和经济运作等间接方式 ,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这种掠夺方式较为隐蔽 ,因此短期不易察觉。但从长期看 ,其负面效应一目了然 :看似公平的自由贸易和国际竞争 ,实则使诸多发展中国家日益陷入依附状态 ,成为靠出卖资源、出售单一商品、依靠侨汇过活的下游国家 ,而美国则凭借微软和波音等高端产品 ,肆意掠夺他国财富 ,由此造成“资本主义绝对规律”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应用。其结果是 :一方面北方国家财富不断积累 ,它们志得意满 ,廉价享受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劳动成果 ,美国越是占据垄断地位 ,它的寄生性和剥削性一面越是显露。“美国在客观上成了一种捕食性动物”。^[2]另一方面是南方国家贫困的积累 ,经济发展日益边缘化。在中东 ,许多国家虽凭借出口石油赚取了不少美元 ,但并未摆脱原料供应国的位置 ,它们在世界产业分工中仍处在下游。英国《经济学家》2002年7月号一篇文章指出 ,在过去20年中 ,阿拉伯国家年人均收入增长率为0.5% ,除撒哈拉以南外 ,低于所有其他地区。另据世界银行的估计 ,自1960-1990年以来 ,阿拉伯世界的劳动生产率以0.2%的速度逐年下降^[3]。这种两极分化现象不可能无限延续下去 ,在找不到有效破解办法情况下 ,第三世界民众便会以非理性方式发泄出来。“9·11”事件并不是文明冲突 ,而是在南北差距不断拉大背景下 ,南方部分民众以极端方式做出的反击 ,这也解释了为何参与恐怖袭击者来自不同国家 ,却共同对美国这个最大的发达国家怀有深切仇恨。

[1]李慎明主编.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上卷)[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7.

[2]法埃曼纽·托德.美帝国的衰落[M].李旦,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20.

[3]Alamy,Self-doomed to failure ,The Economist, Jul 4th 2002.

而国际政治则更多是对国际经济问题(南北问题)的政治反应。西方国家作为强势一方,其主要目标就是维护在国际生产、分配和消费领域中的优势地位。20世纪前半叶,美国尚未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其外交政策也相对进步,在中东以民族解放运动支持者自居(目的是将英法老牌殖民势力赶出中东),保持较好名声。但二战后,随着美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逐渐确立,其外交目标也转向维护既得利益。它在中东的基本政策,如扶植和偏袒以色列、支持态度随和的阿拉伯国家(也就是亲美国国家)、颠覆受伊朗民众欢迎的摩萨台政权、压制阿拉伯世界拥戴的纳赛尔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等做法,除防范苏联外,很重要的目的就是防止中东出现地区性强国带动地区走出积弱积贫状态。这种政策使美国日渐站到了中东多数民众的对立面,变成了阻碍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反动力量。而“9·11”事件正是对美国这种霸权行径的报复和极端回应。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美国插手中东事务,显然是恐怖分子把矛头对准美国的主要原因,这是无法逃避的历史现实。”^[1]

因此,冷战后伊斯兰世界反美情绪高涨的根源,更多是这些国家被压迫阶层与西方政治经济矛盾的外在表现,而不是什么“文明间的冲突”。“伊斯兰”不过是这些恐怖主义者顺手扯起的旗帜和借口。而亨廷顿的观点看似深刻新颖,实则是对现实世界的歪曲、虚幻的反映,它与其说是学者的理性分析,毋宁像巫师的预言:亨廷顿敏感地意识到了现实世界中南北矛盾加剧和霸权主义膨胀,最终必将发生巨大恶果,但他却倒果为因,用“文明”作为分析单位来解释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这种世界观的错误(也就是布什政府的错误)本质上是双重性的:它根据西方的假想来界定伊斯兰,伊斯兰成了西方所说的伊斯兰。”^[2]从战略上看,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所勾画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联盟为敌的战略图景,无形中使西方(主要是美国)成为世界多数国家的众矢之的,这种自我孤立、人为树敌的潜台词,在战略上显得极其愚蠢。

理论的贫困必然导致行动的贫困。由于布什政府的中东战略以唯心主义/理想主义为出发点,因此不可避免地偏离国家利益主线,明显高估自身实力,低估中东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结果自不量力,

上演了一场“堂吉诃德战风车”的悲喜剧。

首先,“民主改造”偏离了国家利益的主线。从逻辑上看,“民主导致和平”的立论本身就有问题。事实上,内部政治制度(是否民主)与对外政策方针(是否亲美)并无逻辑联系。中东国家不乏民主国家(如神权民主下的伊朗)坚定反美而非民主国家(如巴列维统治时的伊朗)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先例。从能力上看,各国制度和文化的都有其生存的合理性,美国纵然强大,但远未到足以改造某一文明体系的程度,也很难料定和控制这种文明改造的最终效果。“鹰派(新保派)自称是现实主义者,实际却变成了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以为只要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专制政权清除掉,就可以自主建立起稳定的民主”。^[3]从实践来看,美国的“民主改造”要么使国家陷入动荡(如伊拉克),要么使反美势力上台(如巴勒斯坦的哈马斯),要么使传统盟友与美国关系日趋疏远(如沙特),削弱双方战略合作基础。^[4]“民主改造战略”完全偏离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使美国在该地区的既有利益变得更加不确定。“民主改造”成了得不偿失的“瞎折腾”。

其次,武力反恐使美国折戟于弱者的力量。恐怖主义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它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类问题。但布什政府一上来就使用“战争”手段对付恐怖主义。由于“基地”组织活动范围遍布整个伊斯兰世界,美国宣布以战争方式对之进行打击,落到实处便成了没有明确作战对象和场所的消耗战、游击战和非对称作战。而这些方式历来是弱者反击帝国战争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超级大国最忌讳和害怕的东西。对相对弱势的极端分子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但他们相信却可以得到一切。地

[1]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M]. 王振西,译. 新华出版社,2005:34.

[2] Pierre Tristram. Obama Declares an End to Clash of Civilizations, <http://middleeastabout.com/od/usmideast/policy/a/clash-of-civilizations.htm>.

[3] Michael C. Hudso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Edited by Louise Fawcet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Middle Ea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27.

[4] Edited by Nora Bensahel and Daniel L. Byman,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Stabil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Rand Corporation, 2004, p.53.

[5] (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 帝国统治世界的逻辑[M]. 阎振江,孟翰,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18.

位优越者反而处处都有可失去的东西。”^[1]他们敢于无所顾忌地使用任何手段、不计较任何伤亡及由此引发的后果,而美军却要顾及来自组织、法律以及道德上的种种限制,“在各种限制累积之下,美国的选择方案将消失殆尽”。^[2]由此美国的反恐战争就变成了消耗战和持久战。据估计,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等伊斯兰动荡地带,美国军事人员与基地人员之比为666:1,这一比率现在激增到1286:1。即使考虑到潜在基地分子的因素,美国军事上仍占有23:1的优势。在近十年的冲突中,美国反恐开支已超过万亿,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由此被拖入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消耗战。

第三,反恐战争使中东格局出现了功能性紊乱。在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前,美国在中东的主要夙敌——伊朗一直面临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东夹西击,但美国发动的两场反恐战争,使伊朗摆脱了塔利班和萨达姆两大敌对政权夹击的地缘政治“枷锁”。^[3]而内贾德上台后坚持强硬核立场,高举反美反以旗帜,从而成为中东颇具号召力的反美“领头羊”。“美国在哪里失败,伊朗就在哪里乘虚而入”,伊朗已经做好填补权力空白的准备。一旦美国在中东大幅收缩,伊朗将成为地区地缘政治的最大受益者。

此外,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文明改造”和师出无名的反恐战争,还加剧了穆斯林民众反美情绪,并使反美恐怖主义得以借“伊斯兰”的旗号动员和组织民众,当初亨廷顿作为预警提出来的“文明冲突论”,居然变成“自我实现的谶言”。

2006年,理查德·哈斯在《外交》发表文章称,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使中东步入美国主宰的时代,但这一时代仅维持了不到20年就告结束。现在,美国在中东影响力大不如前,他断言美国主宰中东的时代已告终结。^[4]作为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著述实际是有害的,它导致了布什政府外交的失败。^[5]

三、再回首已百年身:奥巴马“灵巧外交” 不能超越什么

美国霸权周期历来是“强大—扩张—衰落—收

缩”。自二战以来,美国对外政策共经历了两次大的收缩:一次在20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时期。美国从杜鲁门时期开始,因国力抵达巅峰而持续扩张,结果摊子铺得过大,“十个指头按跳蚤”,毫无机动余地,结果陷入越战泥潭不能自拔,国力大衰,开始全面收缩,让地区盟友承担防务责任,而标志性事件就是1969年关岛发表“尼克松主义”。冷战结束后,美国凭借一超地位,在中东全面扩张,结果导致国力透支,深陷战争泥潭,加之国内金融危机加剧,既定政策难以为继,被迫开始新一轮战略收缩。这种收缩从布什后期就已开始。小布什向尼克松时期的高层智囊基辛格请教,是“尼克松主义”抬头的先兆,撤换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是政策转折的风向标,这与美国当年在朝鲜战场撤换麦克阿瑟、在越南战场上麦克纳马拉辞职异曲同工,将伊拉克安全部队推向前线,实行“伊人治伊”,与当初在越南战争中推行“越南化”如出一辙。

而2010年上台的奥巴马进一步加快了这种战略收缩的步伐。奥巴马继承的中东外交遗产,与当初克林顿从老布什继承下来的完全不同,中东现实要求地区秩序进行重组。^[6]在美国实力不济、四面受困的背景下,奥巴马明确放弃布什时期“文明冲突”理念,尽可能缓解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依靠“巧实力”维护自身利益。奥巴马上任后,大幅推行“中东新政”:与反美国家接触(对伊朗发出和谈信号、对叙利亚选派新大使等),加大扶植亲美国家,用地区盟友和相互制衡来取代美国直接统治,降低反恐调门,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尽快从伊拉克撤军,

[1](美)布热津斯基. 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M]. 王振西等,译. 新华出版社, 2005: 47-48.

[2](美)罗杰·巴涅特. 不对称作战:当前美国军力面临之挑战[M]. (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室, 译印. 2006: 24.

[3]Phebe Marr, U.S Strategy towards the Persian Gulf: From Rogue States to Failed States, Edited by Markus Kaim, Great Powers and Regional Ord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rsian Gulf, ASHGATE, 2008, P.36.

[4]Richard N. Haass, The New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6.

[5]Gershom Gorenberg, Huntington's Legacy, South Jerusalem, December 30th, 2008.

[6]Daniel Levy, President Obam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Israel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2, 2009.

结 论

将反恐战场转移到巴 - 阿地区。其“中东新政”的核心目标就是缓解伊斯兰世界反美情绪和“东向”倾向。^[1]从 2009 年 1 月 20 日发表总统就职演说起,奥巴马即向伊斯兰世界表示,将“寻求一条新的前进道路,以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为基础。”^[2]他 4 月 6 日在土耳其国会演讲时再次表示,美国将与伊斯兰世界建立新型关系。6 月 4 日奥巴马在开罗发表的缓和与伊斯兰世界关系演讲,完全可与 1969 年尼克松在关岛发表“尼克松主义”相比拟。奥巴马坦承,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处于关系紧张状态,并提出了如何化解伊斯兰与西方矛盾的多种想法,公开呼吁美与伊斯兰世界实现和解。^[3]这种战略收缩过程,与历史上的“尼克松主义”异曲同工,都是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回归。

奥巴马意图通过战略收缩化被动为主动,重新掌握中东主导权。但奥巴马很难超越中东已有的现实:从传统安全看,中东的战略重要性决定了美国不会真正退出。在尼克松时期,美国为摆脱越战泥潭推行战略收缩政策,亚洲曾出现过冲突,越南甚至抓住这一机会实现了国家统一。越南并非美国关键利益(当时很多美国人搞不清楚越南这个国家到底在哪儿,不明白美国人为什么要到那里打仗),因此美国可以承受放弃越南的代价。但在美国战略棋盘中,中东的战略重要性是越南所不能比拟的,因此美国不可能承受“失去中东”代价,尤其不可能容忍敌对的伊朗“填补权力空白”。从非传统安全看,中东活跃的恐怖活动决定了美国无法轻易离开。目前,伊拉克已成为恐怖主义的策源地,阿富汗塔利班也已卷土重来;“基地”组织依旧以美国为目标发动袭击。而且也门和索马里等地已成为恐怖主义者的新策源地。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奥尔森 2010 年 1 月 22 日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基地组织把触角伸往其他地区,估计全球已有大约 24 个基地组织支部,且已经扩散到伊拉克、阿拉伯半岛、非洲,以及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不绝,美国就不可能从中东从容脱身。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纵然有心全力收缩,缓解与伊斯兰世界关系,但其“中东新政”调整有限。有学者认为,奥巴马中东政策与布什并无本质不同,而只是前者的副本,这种政策必然失败。^[4]

在国际舞台上,国家间的竞赛乃至存亡兴衰,不是由某次具体战役决定的,而往往是战略优劣的竞争。马汉曾指出:“如果战略错了,那么将军在战场上的指挥才能、士兵的勇敢、辉煌的胜利,都将失去他们的作用,尽管在战略正确的情况下它们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而损害一个国家战略思想的,表面上看是政治家主观判断的偏差,但根本上乃是因哲学体系出现错位。一个国家战略水平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对国际形势认识的深刻程度,而如何认识国际形势,归根到底又取决于用何种哲学思维作指引。因此,国家战略的竞争实际是战略境界——也就是哲学思维方式的竞争。有什么样的哲学立场,就会有什么样的理论和政治实践。而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不管是强调外在精神力量(如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客观唯心主义,还是强调主观意志的主观唯心主义,均已被证明是一种有致命缺陷的哲学思想。用观念解释现实,就像从镜子中观察世界,表面上看,它所描绘的东西与现实世界无限逼真,但终究是“水中月,镜中花”。用这种歪曲现实的唯心主义指导外交战略,无异于缘木求鱼,必将引发国家战略错乱和灾难性后果。在这方面,布什政府的中东战略提供了最新反面教材。“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这种因路线错误导致的“外交后遗症”,不是奥巴马短期的“灵巧外交”所能挽救的。

[收稿日期:2011-09-01]

[1]Beatpanda, Obama's master stroke—rejecting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Daily Kos, Jun 04, 2009.

[2]Barack Obama's Inaugural Address, <http://www.nytimes.com/2009/01/20/us/politics/20text-obama.html>.

[3]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A New Beginning, Cairo University, Egypt, June 4, 2009, http://www.americagov/st/texttrans_English/2009/June/20090123162411eafas0.6576807.html.

[4]Khalid Amayreh, What if Obama's Middle East Strategy Failed?, Islam Online, Aug. 3, 2009.

major powers taking an active part in the regi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has taken on a development trend of a critical nature. In recent years,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environment and in the SCS surroundings areas have brought about quite a number of unfavorable elements. As a result, China needs to take the whole interests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in hand and tries to maintain stabil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ituation. By basing on the belief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the territories concerned belongs to China and advocating co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China should try to seek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he issue by means of setting up relevant control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s as well.

12. An Analysis of the New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 Setup, by Gao Zugui, a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with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a doctoral tutor and a guest researcher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Sweeping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 that took place at the end of 2010 and have been going on up since have drawn the Middle East into a new period of turbulence, transformation and remoulding. The Islamist elements took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to expand their political influences. Changes have occurred by varying degrees in most of the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providing them with a wider space for expansion.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e in the political influences of those forces has also made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ecology in various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In the face of the change, the main regional mechanisms have seen some getting weaker and some going stronger.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has been weakened;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is expanding while the African Union is in the state of ascendancy. Noticeable changes have also taken place to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s of the major powers in the region. Turkey has improved its external environment; Iran is confronted with a growing complexity in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while Israel’s security situation is getting worse.

13. “The lost 10 Years”: A Critique of the Failure in the U.S. Middle East Strategy, by Lin Haihong(F.), a lecturer at the College of Marxism with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The 9/11 event of 2011 considerably changed the direc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the U.S. with the theory of “conflict of civilizations” as its foreign policy guidelines, the U.S. launched two war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in order to promote a policy of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Originally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U. S. and the Islamic world were those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nature created by the disparities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under the U.S.–led economic order after the end of WWII. However, by proceedings from an idealistic way of thinking and departing from the U.S. national interests, the U.S. neo–conservatism undertook what was beyond its power to push forward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democracy”, thus making the U.S. got lost in a ten–year war of attrition and reducing the Middle East setup into a functional disorder. But in fact that might turn out to be a period for the U.S. to further consolidate its footprint in the Middle East. After President Barack Obama came into office, even though he made it clear that he would forsake the concept of “conflict of civilizations” in the Bush era and tried to ease anti–American sentiments from the Islamic world, he still can hardly be detached from the hard reality in the Middle East. Residual effects brought about by a 10–year–long erroneous line will not be healed and remedied by the “smart foreign policy”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